

并不仅仅指生活中自己的父亲，而代表着对生活的所有权力，社会权力也是父权的一种。当你表面上对父亲（父权）服从的时候，你在嘴上对父亲（父权）说“是”的时候，你其实心里说的是“不”！一个弱势者的反抗是沉默的，它埋藏得更深沉。我小时候比较懦弱，害怕所有的强势。这也是我长大成人之后反抗强势的心理基础。父权的东西不仅仅是家庭中的问题，它更多具有社会蔓延的性质，因此它其实是严肃的社会政治命题。在这一点上，许多人看不见，或者故意看不见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至今为止，长篇小说《私人生活》也是你唯一的长篇小说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代表作品。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，之后你一直想接着

写长篇小说，为什么就没有写了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压力吗？

陈染：小时候不很如意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，造成了我显得比较懦弱的个性，但在内心深处却保存了很强的叛逆意识。这种反叛心理很早以前就反映在我的写作当中，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有意识地去写的，我写东西，很多心理状态是无意识状态下的，虽然在思想观念上非常明晰。

我从一开始写就注重每一个个体，不太去关注那些特别宏大又不知所云的概念。有许多人读了我的小说之后给我写信，表示喜欢并理解我的小说，这说明“我”的个人化的东西反射到他的身上，得到他的感触与回应，这种能够有所呼应的“个人”其

实就体现了一种与他者的链接，而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跟别人沟通的过程。这就是“个人化”小说的意义与价值，尽管我并不是提前预知它究竟呈现出多少社会意义。

当想表达的难以表达时，就不说（不写）吧。虽不至于“洗洗睡吧”，起码躺着养神。我一直在想，怎样突破自己，只是没有完成新的长篇，我不愿意写出来一个长篇温温吞吞，毫无光彩，毫无突破，成为滥“菜”堆里的一个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重要方面，也就是前边提到的，我常常会有各种各样不合时宜的想法，拐弯抹角恐怕难以书写，这种限制使我很难完成长篇。

我感觉，岁数越大，想说的话越少，经常是想一想之后，觉得不说（写）也罢，算了。我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只字不写、闭门索居。我不想靠计划过日子，能怎样就怎样吧。现在，愈发体会到“顺应”这个词的智慧，这里的“顺应”不完全是指对于外部的什么力量，而是顺应由内而来的人的天性，现在这个年纪了，我更愿意做个性情化一点的、自在一点的人。

坦白地说，无论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接受，其实我们已经和这一生90%的人见完了最后一面。如果从“见字如面”这个角度看，还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呢！

下图：陈染生活照。

